

「全新演绎安史之乱下盛唐诗坛的兴衰风云」

张建军◎著

安史之乱 与盛唐诗歌的新变



安史之乱不仅是唐代的一次政治大地震，它对当时的经济和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安史之乱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尤其是盛唐诗歌。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诗人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心态上，还体现在诗歌的内容题材及艺术风格上，本书旨在探讨安史之乱给盛唐诗歌带来的种种变化。

吉林大学出版社

安史之乱

● 盛唐诗歌的新变

傅璇琮 著



本书是傅璇琮先生关于盛唐诗歌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也是其“盛唐诗歌研究”系列丛书的最后一部。全书以安史之乱为界，探讨了盛唐诗歌的嬗变。作者认为，盛唐诗歌在安史之乱前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诗歌的主题、风格、形式等方面，更体现在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和诗人的精神世界。本书通过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理论探讨，揭示了盛唐诗歌新变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深刻的思考。

101 目录表

101 目录表

安史之乱与盛唐诗歌的新变

张建军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史之乱与盛唐诗歌的新变 / 张建军 著. — 长春: 吉

林大学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601-4524-2

I. 安… II. 张… III. 安史之乱—影响—唐诗—文学研
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9865 号

安史之乱与盛唐诗歌的新变

张建军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许海生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总印张: 8.5 总字数: 150 千字

ISBN 978-7-5601-4524-2

封面设计: 出书网 | 丁岩

北京奥隆印刷厂 印刷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前言

在对唐代文学的研究中,学术界基本认同高棅把唐诗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的观点,因为这种分法从一定意义上厘清了唐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表明了唐代文学嬗变的过程以及各个阶段的不同创作原则、艺术特点、美学风貌。但其不足在于,这种归纳法只是概括了某一时代最主流的文学创作情况,而对于处于历史过渡阶段、转折阶段的文学现象却只是蜻蜓点水。近年来,许多学者致力于这些过渡阶段的研究,从而填补了一些研究史上的空白,也因此将文学史的发展还原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比如对贞观文坛的研究使我们明白盛唐文学之形成,对五代十国文学的研究让我们看到唐文学之延续与宋文学之滥觞。

笔者正是受到了这些启发,想在盛唐与中唐文学之间寻找过渡的契机与轨迹。此前也有学者对这一过渡阶段作过研究,如蒋寅先生的《大历诗风》对大历时期的诗歌作了考察,指出了盛唐与大历诗歌的不同。但问题是,盛唐诗歌风貌何以转变为大历文学?盛唐文学中的一些因素经过了怎样的转换与扬弃而为中唐文学所吸收?显然在盛唐与大历中间还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仍然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于是,笔者便将目光凝注在安史之乱这一使唐代由盛转衰的重大历史事件上。

对于安史之乱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前辈学者都已经注意到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专门对安史之乱及有关文学问题研究的学术论文有20篇左右。总的说来,以往的研究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就,但也存着一些不足。

其一,学者们普遍注意到安史之乱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并且个别学者撰写了专门的论文。如:清华大学1935年的硕

士研究生王忠先生曾写了《安史之乱前后文学演变问题》，他将唐代文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作了一番梳理，注意到了安史之乱前后文学的变化。他指出“大唐帝国安史之乱前后之变化，自国力言之：前此政令推行于全国，声威远及於四夷。后此则藩镇分割山东，贡赋不入；吐蕃盗据陇右，国门为疆。自种族文化言之：前此尚有相对之调谐，后此则自民族之冲突转入文化之对立矣。自文学演变言之：前此为浪漫文学之时代，后此则为写实文学之时代。故安史之乱不仅于有唐一代之政治史为一分水岭，实亦文学史上之划时代之界线也。”王忠先生进而指出“安史之乱于唐代政治史上虽为大时代之没落，于文学史上之光辉则固足以照耀千古也。”可以说，这篇文章已经注意到了安史之乱期间文学创作在唐诗发展史上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意义，并给其最为合理的定位，可惜这篇文章未能展开，仅仅选取了杜甫一人作为个案来论证安史之乱使文学由浪漫转向写实这一创作趋向，略显单薄。此外，孙学堂先生在其《中国文学精神》中也指出安史之乱是盛唐文学的分水岭：“以安史之乱为界，唐代文学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承汉魏六朝之余绪，贯以崭新的时代精神，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空前绝后的辉煌气象；后期启宋元文学之滥觞，推陈出新，开辟了文学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简要概括这个时段的文学精神，我认为前期的特质是‘情感主义’，后期则是‘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交融互补。”“唐前期‘情感主义’文学精神可以概括为三种基本样态：浪漫之思，雄豪之气，清远之境。它的主要载体是诗歌。唐后期在‘情感主义’总体氛围笼罩之下又有所变异的文学精神可以概括为两种基本样态：沈郁之调，世俗之味。”诸如此类，看到安史之乱在文学发展史上重要意义的学者不在少数，甚至于学者们在写文章时，凡是提及安史之乱都会缀写两句安史之乱于历史、于文学的转折意义，可惜他们都未能就安史之乱中文学创作实绩给予分析，从而找出其变化的例证和轨迹。

其二，许多学者从安史之乱与盛唐诗人个体之间的关系出发，探讨战乱对个人生活状态、心理状态、文学创作的影响。近十年来，在这方面较有影响的论文有十多篇。比如裴斐先生的《唐代历

史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创作》，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从李、杜在安史之乱中不同的经历探讨了其诗歌创作的转变和意义，他指出“进入动乱的诗人，王维、储光羲不光彩地受过伪职，后来一个更消极，一个贬死在外。高适在乱中发迹做了大官，这次动乱却没有在他诗里留下明显的痕迹；后来著名的大历十才子，如钱起、郎士元、韩翃都是天宝进士，经历了安史之乱却并没有反映这个时代；知名诗人当中惟岑参、刘长卿留下不多几首描写战乱的作品。正是在别人都已经消声匿迹，盛极一时的诗坛归于沉寂时，李白和杜甫却变得空前活跃，他们一个在黄河流域一个在长江流域，各以其独具特色的诗篇共同反映了这场灾难，不愧为和民族共命运的诗人。”此外，肖瑞峰《论李白安史之乱初期的诗作》、许总《论元结及〈篋中集〉诗人的人生态度、文学思想与创作倾向》、蔡堂根《高适晚年诗歌的心理透视》、李俊标《略论王维安史之乱后的心态》等文章都非常有见地地分析了诗人与时局之间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诗风的转变。此外，一些学者对盛唐重要诗人在安史之乱后的遭遇和经历也作了考证。如郁贤皓先生先后作了《李白生平研究综述》、《李白洛阳行踪新探索》、《安史之乱初期李白行踪新探索》，对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经历做了明晰的阐述。对王维在乱后的研究，有陈铁民先生的《王维生平五事考辨》、杨军先生的《王维事迹证补》、毕宝魁先生的《王维安史之乱“受伪职”考评》等，这些都对诗人在此时期的经历作了较详尽的梳理，为本文研究诗人与安史之乱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其三，学者们注意到这一时期的诗风产生了变化。个别学者从历史、政治、文化的维度探讨诗风新变的原因，从而使我们对安史之乱中文学创作的研究有了深入的进展。如吴相洲先生的《论唐肃宗黜华用实主张对诗风新变的影响》就是这方面的一篇力作。他指出“安史之乱对诗风新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学术界对这种影响的分析还显不足，往往只是着眼于战乱使诗人情绪走向低沉这一作用，未能从时人主动调整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方面做深入研究。笔者经过初步研究发现，唐肃宗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一条黜华用实的用人方针，对士人的行为风范主动加以

改造,使之由高华走向沉实,进而影响到诗风多项内容的变化。”查屏球先生在《江左名士文化与李白晚年悲剧》一文中,从李白具有名士风范入手,分析了他在安史之乱中的政治行为及其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初盛唐文化是在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中对南北文化的整合,盛唐名士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体现,盛唐诗人身上多少都带有名士风范。“我们可以看出以东晋南朝名士的文化意识投身于现实政治,是李白的天真所在,也是他的悲剧所在。他的悲剧实质上是名士文化传统与儒家君臣观念的矛盾。这就如李白是盛唐文化的代表一样,他晚年的悲剧也正是这一文化沉落的典型体现。它传达了一种文化信息:这就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名士风流至此已难以维系。”余恕诚先生《杜甫在肃代之际的政治心理变化》一文则从不同皇帝统治和政治特点入手,指出杜甫对于玄宗、肃宗、代宗的不同态度亦是影响其人生选择和诗歌创作的因素。他指出“对于玄宗,杜甫因其曾致开元之治,又自认为玄宗与己有文章知遇之恩,诗中常流露很深的感戴、忆念之情,于其过失,亦多有回护。……杜甫于代宗未曾发生直接联系。代宗即位,杜甫始则寄予希望,后来虽有失望,但规讽之态度,仍然本着谆谆告诫的谏诤之体,自是不乏忠爱之忱。唯独于肃宗,在其统治后期,他的基本态度是不满和反感的。”这些从政治、历史、文化角度所进行的透辟的分析给我以启发,并从学术方法、学术视野上给我以借鉴。

总之,从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安史之乱不仅是唐帝国由盛入衰的关键,也是唐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遗憾之处在于学者们只作了散点性的研究,对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研究还没有形成整体性、群体性、社会性的把握。笔者正是试图对此作一全面的探析。

首先,对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时间跨度应该有一个明确的限定,从而合理地截取历史时段作为研究的范围。笔者认为,从张九龄罢相李林甫出任宰相(开元24年,公元736年)到安史之乱平定后的第九年,即大历7年(公元772年)元结去世,其间跨度为36年的文学都可以纳入安史之乱文学探讨的范围。从起点上来讲,开元24年,是唐代政治统治的分水岭,李林甫担任宰相是玄宗朝

由“文治”转向“吏治”的标志,此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执政的一段时间正是安史之乱最终爆发的蓄积时期。这一时期内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既是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同时也是诗人创作变化之诱因,盛唐诗人觉察到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之后,诗歌创作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直至安史之乱爆发后,安史之乱前所出现的反思、写实等特征才变得明晰起来。从终点上来看,大历7年,安史之乱虽已经被平定9年,但战乱的余绪仍影响着那批走出盛唐的诗人的心态和创作,诸如杜甫、元结、岑参、贾至等盛唐诗人也从未停止过创作。他们曾经历开、天盛世,而战争却摧毁了帝国原有的繁华。战乱虽被平定,但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和大大小小的叛乱使他们已经认识到帝国江河日下的趋势,这个时候这些走出盛唐的诗人的创作带有复杂的感情,追忆、感伤、反思、逃避等成为安史之乱平定后诗坛的创作基调。公元769年,岑参去世,次年(公元770年)杜甫去世,标志着盛唐诗人创作的大势已去。公元772年,元结、贾至又相继离去,标志着盛唐诗人这一群体的消失。继之而起的大历诗人如刘长卿、钱起等人则标志着另一个文学时代的开始。

其次,对这一时期文学探讨必须有一个明晰的思路,同时要为诗歌风貌寻找一个改变的背景,即为其改变确立政治、经济、文化的平台。故而,本文的写作将从安史之乱前、安史之乱中、安史之乱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具体情况入手,通过对诗歌创作实例的考察,来探寻每个时期诗歌创作的特点及与盛世诗歌创作相比所发生的变化。这样,就可以找到使诗歌创作发生新变的深层次的原因,在社会状况与诗歌风气之间架起桥梁,继而深入地分析和认识诗歌创作变化的脉络和走向,尽可能地归纳出文学创作及其风气改变的规律。通过考察,笔者认为,这条线索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安史之乱爆发前社会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危机,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则表现出盛唐诗人对政治格局的体认与思考,对个人穷达的追求与悲叹,对民生疾苦的关心与同情。安史之乱中帝国的权威遭到破坏,战争使社会混乱,生灵涂炭,诗歌创作则表现出盛唐诗人对政治时局及国家命运清醒的反思和写实的精

神。在这种情况下,盛唐诗人在乱中的诗歌创作呈现出由热情激越趋向冷静凝重、由异采纷呈趋向单一务实、由开阔高华趋向内敛低沉、由自然灵动趋向沉郁锻炼等特征。安史之乱平定后,盛世一去不返,这给诗人们带来了心灵的巨大伤痛,此时,盛唐诗人或者痛定思痛,把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结合起来,总结帝国和人生的得失。或者移情于山水之中,或回归内心,寻找心灵的解脱。

再次,对盛唐诗人群体的界定也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着眼点。唐代是一个诗人辈出的时代,对于其分属时期的界定往往都是研究者争论的问题,如对杜甫究竟是盛唐诗人还是中唐诗人,学者一直都有所争论。要探讨安史之乱中盛唐诗人的诗歌创作,必须有一个理论支点,从而分离出具体的可研究的对象。本论文旨在探讨盛唐诗人在安史之乱前、乱中、乱后的创作,从他们创作风格的改变来探讨时代精神的变化和诗歌创作的变化。因而,列入本文讨论范围的诗人一定要经历过开、天盛世,有着盛唐时代特有的自信、开放、疏阔等精神特征。同时,他们又经历了安史之乱,切身体会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过程,并且其诗歌创作的高峰期也应该是在安史之乱前后一段时期。之所以分析这一群诗人,就是期望能从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找到盛唐与中唐之间演变的轨迹,更细地划分,则是找到盛唐到大历时期文学的走向,从而演绎出中唐文学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的历史原因。从这个着眼点入手,安史之乱前的盛唐诗人群体从时间上主要指在盛唐时期登上文坛的诗人,其创作活动大多开始于盛唐,且一直延续到安史之乱前后。从创作内容上来讲,他们的创作大多呈现出两个倾向,一是对盛唐时代由衷的赞美以及对理想充满浪漫色彩的抒写,一是在乱前对时代由盛而衰的反思以及对社会现实主义的思考。乱中的创作群体从时间上来讲,就是指从公元755年到763年这八年的战乱期,他们或者被卷入战争混乱之中,或者游离于战争边缘,或者逃避、远离战争,无论是何种方式,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介入到时代之中。他们或者抒写战争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混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或者抒写抑郁的情怀和心情,或者抒发光复大唐帝国的雄心,或者远离战争而躲入自己的思维空间去体会山水胜境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

乱后的创作群体从时间上讲则是那些亲历战乱的盛唐诗人,以元结、贾至等人的去世为下限,表明随着盛唐时代的重要诗人相继去世,诗歌创作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从创作内容上来讲,这段时期的诗歌创作带着些许对盛世的念想,同时又带着不得不面临严峻形势的悲凉。

最后,要想勾勒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基本状态和变化轨迹,就必须有相应的方法。本书拟用的方法是历史—政治—文化的分析法,意欲在较为广阔的平台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进行较有深度的分析。此外,对比方法的运用也将是本书采用的主要方法,通过不同诗人之间的对比、同一诗人在不同阶段的对比、安史之乱前后的文学与盛唐文学对比等多层次、多角度的比较,分析盛唐诗人是如何从盛世中淡出,其创作又如何不再具有盛世的情怀,从而为其诗歌创作的新变找到最符合历史、符合人生的理由和发展取向。定量分析与绘制图表也是本书尝试使用的方法,这样可以更为直观地表示一些具体情况,主要是自己考察的结果以及援引他人研究成果。

第四章 对战争的记忆	70
第一节 安史之乱中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及文化的转型	70
第二节 安史之乱中唐代文学、经济格局的转型	97
第三节 安史之乱中唐代文化思潮的转型	104
第五章 安史之乱中的盛唐诗人群体	120
第一节 安史之乱中盛唐诗人的迁移	129
第二节 安史之乱中的三大诗歌创作中心	164
第六章 安史之乱中的盛唐诗人创作及诗风新变	180
第一节 以陈子昂、李白、杜甫为代表的盛唐诗人创作	180
第二节 盛唐诗人创作向中唐诗人创作	192
第三节 盛唐诗人创作向中唐诗人创作	193

目 录

第一章 唐玄宗朝后期社会政治、文化格局及诗人群体	1
第一节 唐玄宗朝后期社会的政治格局及安史之乱的成因	1
第二节 唐玄宗朝后期社会的文化思潮	18
第二章 唐玄宗朝后期盛唐诗人的心态及诗歌创作	46
第一节 进身途径遭到破坏	46
第二节 对时局日渐衰落的忧虑	54
第三节 对民众苦难的摹写	62
第四节 对战争的议论	70
第三章 安史之乱中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及文化的转变	83
第一节 安史之乱中唐代政治、经济格局的转变	83
第二节 安史之乱中唐代社会文化思潮的转变	104
第四章 安史之乱中的盛唐诗人群体	129
第一节 安史之乱中盛唐诗人的迁移	129
第二节 安史之乱中的三大诗歌创作中心	144
第五章 安史之乱中的盛唐诗人群体及诗风新变	159
第一节 由热情激越趋向冷静凝重	160
第二节 由异彩纷呈趋向单一务实	172
第三节 由阔大高华趋向内敛低沉	183

第四节 由自然灵动趋向沉郁锻炼	200
第六章 安史之乱中盛唐诗人的个案研究	207
第一节 李白	207
第二节 杜甫	226
第三节 李、杜在安史之乱中诗歌创作的时代意义	245
总 结	256

第一章 唐玄宗朝后期社会政治、文化格局及诗人群体

盛唐社会辉煌的政治业绩、开明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政策，使身处盛世的诗人们深受时代的鼓舞和激励，在这种盛世精神的感召之下，他们成为中国古代诗坛上最有个性的诗人群体，他们满腔的政治热忱和美好的人生追求构成了彪炳千秋的“盛唐气象”，成为盛唐诗歌最为宝贵的艺术财富。正因为如此，盛唐诗歌所创造的高度的艺术成就和极为宝贵的文化精神为世人共激赏。但是，在玄宗朝后期，一派升平气象之下却隐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社会危机，开元二十四年，随着李林甫等一批“干吏之士”走上政治舞台，唐代政治生活日趋失衡，大力拓边的军事政策也导致内轻外重军事格局的形成。盛唐诗人就生活在诸多矛盾郁积、酝酿、发展的时代当中，他们凭借自己特有的政治敏感，深切地感慨个人的政治前途，深入地思考国家安危，以诗歌艺术反映历史巨变之前的感受，显示出这一时期唐诗创作丰富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水平。还有一些诗人开始在对儒家政治思想的颂扬中寻求救治社会之道，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笔者拟从唐王朝在政治上的由盛而衰切入，探讨盛唐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心态以及盛唐诗歌的流变和走向。

第一节 唐玄宗朝后期社会的政治格局及安史之乱的成因

无数事实证明，盛极而衰这一规律导演了人世间的沧桑变化，令后人扼腕悲叹。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的李唐王朝

也在劫难逃，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冬发生的安史之乱使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上演了兴衰骤变的惨剧。安史之乱历时并不长，从755年爆发至763年被平息，前后历时八年。叛军的力量也并非强大到无法抵御，而且，叛乱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件却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进程。联系安史之乱前的唐代社会现实，这一灾难源于复杂而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其所由者渐矣。

李白在《古风》其四十六中曾盛赞唐王朝“一百四十年，国风何赫然！”可谓国富民强，称雄天下，但此时已隐藏着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诸多矛盾。林庚先生指出：“盛唐时代之所以一去不返，主要的乃是因为这时封建社会内部的经济发生了危机，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因此开始走了下坡路。而这些又都只是在安史之乱平定后才能为人们所逐渐认识。”^[1]可见，安史之乱是使这一切矛盾与危机由隐而显的历史工具。现在我们来考察安史之乱爆发前一段时期，即玄宗朝后期的政治格局。

一、皇权的旁落与相权的膨胀

开元前期，唐玄宗为政开明，任人唯贤，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他通过对权臣的贬抑，消除了身边的隐患，同时起用了著名的宰相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真正实现了“官不滥升，才无虚受”^[2]在官吏的选择上，革除了韦后卖官鬻爵的任官制度，恢复了太宗时的谏官制度，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形成了君明臣贤的良好政治风气。另外，他通过科举扩大了选用人才的范围，网罗了大量的人才，扭转了“世胄躋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咏史》）的局面。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也给中下层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培养了盛唐文士建功立业的志向。

开元后期，唐玄宗逐渐骄盈自满，荒于政事。武力拓边开支冗多、土地兼并、人口逃亡等社会矛盾也日益复杂尖锐，在社会经济下滑的情况下，统治者的享乐之风却有增无减，一系列的问题导致国库日渐空虚。《新唐书·食货志》载：“天子骄于快乐而

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所入，于是钱谷之臣，始事隼刻。”为了缓解和解决这些矛盾，唐玄宗开始贬斥以张九龄为代表的象征文治教化的“文学之士”，转而启用一些狠重苛厉、擅长聚敛的“干吏之士”。《新唐书·张九龄传》载：

李林甫无学术，见九龄文雅，为帝知，内忌之。会范阳节度使张守珪以斩可突干功，帝欲以为侍中。九龄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后授，不可以赏功。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对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东北二虏，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将以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九龄执曰：“不可。尚书，古纳言，唐家多用旧相，不然，历内外责任，妙有德望者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谓何？”又欲赐实封，九龄曰：“汉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汉法，太宗之制也。边将积谷帛，缮器械，适所职耳。陛下必赏之，金帛可也，独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岂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门阅哉？”九龄顿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夫，盖绛、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实耻之。”帝不悦。翌日，林甫进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书邪？九龄文吏，拘古义，失大体。”帝由是决用仙客不疑。九龄既戾帝旨，固内惧，恐遂为林甫所危，因帝赐白羽扇，乃献赋自况，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虽杀身而何忌？”又曰：“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篋中。”帝虽优答，然卒以尚书右丞相罢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禄养恩矣。尝荐长安尉周子谅为监察御史，子谅劾奏仙客，其语援讖书。帝怒，杖子谅于朝堂，流瀼州，死于道。九龄坐举非其人，贬荆州长史。虽以直道黜，不戚戚婴望，惟文史自娱，朝廷许其胜流。

可见，张九龄与李林甫在用人标准上大相径庭，一个是文学之士，一个是干吏之材。张九龄主张按传统观念用人，主张所用之人知仁识义，而李林甫则主张用一些有丰富的政治经验的政客。这反映了两个人不同的贤能标准和人才观，同时也表明了两个人不同的人生取向。

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由李林甫继任宰相。为了确保自己大权独揽，李林甫一方面广为罗织党羽，一方面竭力阻挠“文学之士”的仕进之途，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文人进身的渠道与环境，极大地伤害了文人从政的热情：

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3]

李林甫为了实现自己专宠的地位，保证大权独揽，采用一切手段来扼制人才，同时，他借用玄宗对他的信任蒙蔽玄宗的视听，把大批的有理想有抱负的士人拦截在了仕途之外。天宝六载：

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佞言污浊圣听。”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委尚书覆试，御史中丞监之，取名实相副者闻奏。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4]。

李林甫的这种行为致使广大士人才子希望通过科举进身仕途的想法破灭。元结、杜甫等人都成为这次科考的牺牲品。同时，李林甫也不允许文儒通过献礼而直至青云。在唐代，通过给达官贵人、甚至皇帝直接进献文章也是士人进身仕途的一种方式，他们通过文章表达对君王的忠诚、对时事看法、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以及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通过进献文章，如果能够得到皇帝的赏识，就可能平步青云。但是，这一途径也由于李林甫的专权而不得实行。“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5]尽管玄宗对杜甫的三大礼赋极为赞赏，杜甫也曾骄傲地写道“彩笔昔曾干气象”，也炫耀自己曾“昭代将垂白，途穷乃叫阍。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但最终也未能凭借自己出色的文学才能和儒学修养而直至青云，结果却是“主上顷见征，欷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